



君子小人之辨

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家学派,强调中国特色的精英文化,对这种中国特色精英的说法,可以是“国士”“士大夫”,可以是“大丈夫”,可以是“仁者”“义士”,可以是“君子”。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君子对比小人的说法在界各地各群体中,最为脍炙人口,广泛流传。

君子小人,基本上不是一个阶级官职与经济地位的说法,而是一个对于教育教养、文明程度、品质内涵、精神素质的高低文野阔狭美丑的分辨。在庶民当中,“小人”云云,最多言其低下,并不意味着多么恶劣。孔孟都指出“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的特点,这里的小人指的是缺少更大的格局,更大的主动性、创造性,调整、应变与发展能力

的普通人。但在高层权力运作空间,“小人”之称就很可能可怕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小人的得计,被认定为后汉皇朝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

君子的中庸之道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憚也。”就是说君子是守持中庸之道的,小人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君子对于中庸之道,是时刻都在践行的,小人那里的中庸之道不能守持,因为小人是要胡作非为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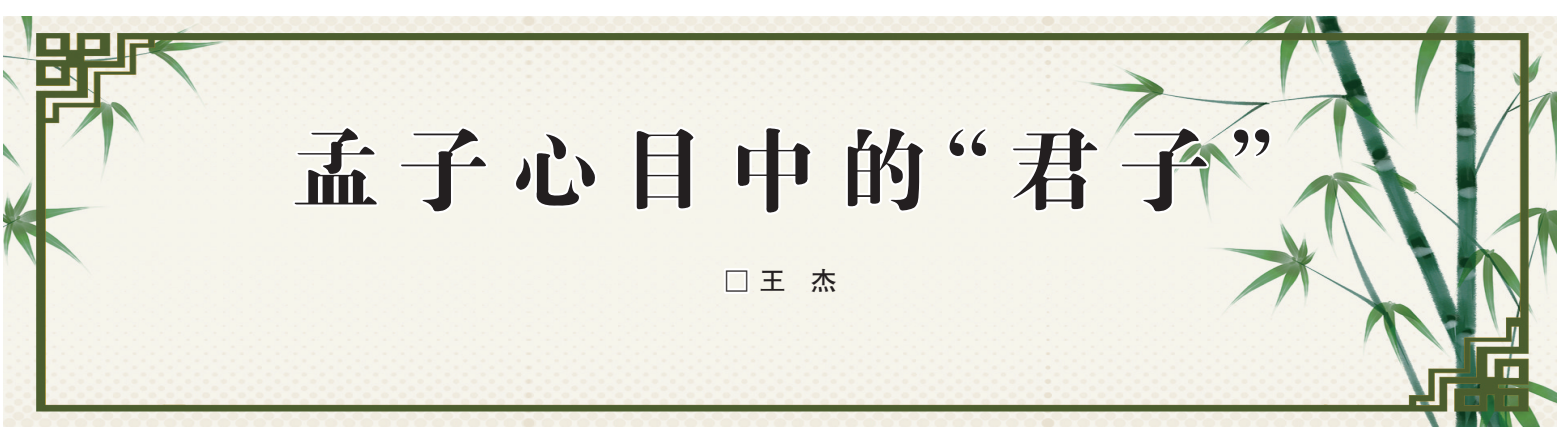
孔子等大儒提出了大量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都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君子讲究中庸,小人反对至少是不守持中庸呢?这是孔子等的一个重要发现。什么是中庸,中的含义是准确、合适,不过度也不折扣,不片面,不极端,毋为已甚。用今天的话说,是科学性、准确性,其义更近乎去声的中,打靶十环的中。庸是正常、普通,是可用与有用,即有效性、务实性与建设性。君子是受过教育的,懂得自律的,有家国担当的。他们注重个人修养与思想境界,做事追求准确、适宜、正常、有效,防止使气任性、感情用事、夸张无度、过犹不及、毛泽东称之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这里说的肆无忌憚,正是由于小人言行没有尺度,没有标准,没有界限,没有底线,也就没有了原则,没有了掌控自律,就会是风、闹、震、哄俱全,与人为恶、浑水摸鱼、兴风作浪。

说到这里,此种小人说,或与民粹含义有相通处,他们有一定声势,需要很好地对待与团结,他们常常有对于高大上者的羡慕嫉妒恨,而在所谓优胜者倒霉的信息中获得安慰、宣泄与快感。他们人云亦云,幸灾乐祸、添油加醋、唯恐高大上不长体癣烂疮。

君子小人的问题,是品德的问题,也是修养教化的问题,还是治理与用人中的课题。想想2000多年前有关的一些说法,不能不佩服先贤的眼光与警示。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化部部长)



王 杰

君子一词,最初为社会阶级地位之象征,是与普通百姓相对,为贵族所专有之称号。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君子这一概念,作了创造性改造,赋予其更多道德内涵,使其从社会阶级概念,转变为“人人可学而至人格典范”。战国时期,孟子于孔子基础上,又加以阐发,在强调内在道德之同时,又突出德性之外在发展,将那些具有高尚道德,且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实现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具有完美理想人格之人视为君子。

孟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道德修养的,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采取积极之生活态度。在对君子如何进行修为之问题上,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君子必自反也。”从自我内部去寻找施行“仁义”的原因,而不是向外部去探寻其根由,实际上这正是孔子“君子反求诸己”思想的再体现。如果一个人以“自反”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施行“仁义”,“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那么这个人也就具有了君子之要求。

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之实现,追求完美崇高之理想人格境界,一直是包括孟子在内之儒家学者所孜孜以求之重要课题。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要具有内在道德,还要把这种德性推向外,以便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孟子将建功立业视为君子人生的一部分,他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将

君子视为圣人,强调通过教化,推进王道实现。又《孟子·离娄上》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下》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孟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内圣外王”之修为,能以个体之道德自觉为修身原则,终而立于天地间,担当起国家、民族之重任。

孟子非惟言出心目中君子形象,还道出了塑造“君子”之主要方法:一是修身修心与道德修养。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验之内心善念来激发唤起人潜意识中善之本性,极力促使人们通过主体自身之道德修养来达到改造自我之目的。孟子认为,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事物之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孟子十分重视“修身”之重要性,把“修其身”看作是治天下之开始,孟子所谓“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主体之修为,是提高和完善自我价值的一种个体之主观能动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修心、修行两个方面。先有“心”之所思,而后有具体之行为,故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身又是齐家、治国之根本。这种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反过来又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来达到由外及内之

规定来达到改造人的目的。这两种不同之“流程”或“修心”路线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内部修养循环系统,是“内圣之道”之完全体现,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家,国,天下”之事便畅通无阻了。为了实现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目的,孟子突出强调了“心”在这一过程中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尽心不但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孟子之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之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

二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塑造“君子”之另一方法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当时之社会 and 道德问题:一种是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之方式,目的是使他们接受他所主张之“仁政”学说。但这一方法在当时没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道德修养之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人的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之关系。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便可能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之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他告诫梁惠王如果想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大欲”,就必须节制自己肥甘轻暖、声色犬马之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天下”之更大欲望。孟子试图使人们对物欲之追求在一种合理之道德范围内进行。孟子主张“节欲”“寡欲”,并不是否认人有正常之欲望,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

还认为人之欲望正是人伦道德之基本出发点。当人之欲望与人之道德理性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合理地以外在之“礼义”和内在之“仁”来限制人之欲望。孟子倡导的节欲、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养性”之一种手段和方法。孟子认为,人道德修养之好坏以及修养境界之高低,都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追求生理层面的自我满足,就难以发掘内在之善性,就难以成为道德君子;要成为道德君子,首先要“立乎其大”,培养自己之理想人格,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心”之向外扩充,使“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完善之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道德价值。孟子从人之普遍性原则出发,目的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促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去进行道德修养,最终成为“君子”。

孟子之君子观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之人生价值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仁人志士无不以这种孟子之君子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塑造自己的人格。他们的精神与气概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之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孟子心目中的君子,更是我心中向往之君子。



王秋波



济南市图书馆泺源书院展示厅

一时文风兴盛。

泺源书院的教学方式一般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鼓励学生认真思考、问难论辩。比如,山长匡源,主持泺源书院和尚志学院近20年,从学弟子达到3000人,科举金榜高中者400余人,门生中成名者多至百人,这在清朝历

史上是少见的。匡源20多岁即中进士,曾为咸帝讲经。作为一代名声卓著的大儒,匡源坚持以海人不倦的精神教书育人,根据受业者水平的高低、天赋的大小和闻道的先后分类施教,力求使更多的学子成为栋梁之材。

泺源书院的讲授内容以四书五经

及程朱的阐释为主。比如,山长桑调元学宗程朱,尚志力行。提倡贯通群经,主张不通群经,不足以治一经;不知史法,不足以与谈;不博研象纬、山川、方名、器数之岩迹,不足穷遐极幽,俾微言大义之可考而彰也。桑调元讲学期间,制定《泺源书院学规》,开篇即强调朱子之学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自来书院学规,惟朱子白鹿洞科举圣贤要语,本体工夫,具备规模宏远,节目详明,至矣尽矣”。可见,泺源书院治学之严谨。

还有,被后世封为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的缪荃孙,应山东巡抚张曜之聘到泺源书院讲学,为泺源书院金石学研究带来了契机。缪荃孙治学注重实效、学风尚朴,采用八股试帖、经史词章兼顾的教学方式。任教期间除了最后的决科题外,凡出课题十次,基本上是十天一课。泺源书院学生众多,缪荃孙收课卷最多时达到800本,其讲学任务非常繁重。缪荃孙评学生的课卷,不仅仅是评出优劣,还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学生的文章加以修改,并为泺源书院辑录了一部专志《泺源小志》。

除桑调元、匡源、缪荃孙外,主讲泺源书院的沈起元、何绍基、孙葆田、毕沅、王启元、沈可培等人皆为

当时学界之翘楚,书院肄业诸生亦是人才济济。

崇尚实学

泺源书院以“明德新民”为教育理念,以“弘扬古学,砥砺学术”为学术旨归。崇尚实学当以制定学规为重。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训课规条》,提出“为学莫先于立志,为学莫要于寡欲,为学当敦实行,为学当秉虚衷,为学当勤讲读,为学当慎交”等要求。这六个“为学”规条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方法的指导,而且对学生的品德和行为规范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使得学生明白:人生在世,肩负着明德新民的重任,而不仅仅以博得一个功名为目标。书院对学生的课业要求非常严格。“书院应严立课程,以杜浮伪。嗣后仿令诸生,将所读经书诗文,每人各订一册,逐日填注,送监院官标识;五日一次,呈掌教查考;每月终,汇送济东道察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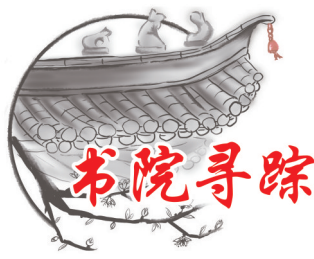
正因为如此,泺源书院一直秉承“为国储材”的办学宗旨,培养出了周永年、王懿荣、王寿彭、法伟堂等一批著名学者。周永年是清代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也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始人。青年时代即就学于泺源书院,并深得书院讲席沈起元的赏识。

特诏征修《四库全书》,后历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他在佛峪所筑书房号称“林汲山房”,旁边的山泉被称为林汲泉,至今尚存。王懿荣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是甲骨文的发现者,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此外,还有众多品学兼优者,不胜枚举。

复建秉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之下被迫实行“新政”,正式颁布书院改制的上谕。山东巡抚袁世凯遵旨上奏《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对书院改制后如何创建大学堂作了详尽说明。同年,内阁奉上谕,通令全国仿照举办。官立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的前身)在泺源书院正式创立。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被光绪皇帝通飭各省要求参照办理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学章程,不仅为山东大学一百多年照章办学奠定了传统基础,而且为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树立了典范。

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大学堂由泺源书院旧址迁入省城西南杆石桥新址,改称山东高等学堂。泺源书院旧址改建为山东师范学堂。至此,泺源书院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现代高等教育的转变。泺源书院“明德新民”的教育理念,“弘扬古学,砥砺学术”的学术旨归,对山东的学术发展,特别是金石考古学的研究影响深远。目前,泺源书院已在济南市图书馆复建了书院展示厅,复建工作已全面展开。



积学大儒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泺源书院鸿儒大家的心愿。泺源书院的任教者都是当时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他们或是担任书院的山长,或是主讲,